

王符的哲学思想

喻博文

一、王符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时代

王符是东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是安定郡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南）人，字节信。他的生卒年月《后汉书·本传》未详。但依和他友善的马融、张衡、皇甫规等人的生卒年月来推断，他的一生大抵不出东汉和、安、顺、桓等四帝时期。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曰：“《潜夫论》十卷，汉王符撰，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新旧唐志、崇文目、读书志、通考、宋志俱载之。晁氏称其在和、安之世，耿介不同于俗，遂不得进，隐居著书三十六篇。…以其本传考之，节信之著书，当在桓帝一世。”（卷三十六）周中孚把王符的著述时间放在晚年，是比较可信的。

王符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汉王朝内部酝酿更大危机的时期，在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着更加残酷的压迫、剥削，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暴骨荒野，活着的人也挺而走险，起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这些起义是黄巾大起义的前奏。这种社会阶级斗争的风暴，对王符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反映在他的《潜夫论》中，便有很大部分的篇章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以“末世”、

“季世”譬况当朝。

关于王符的家世，《后汉书·本传》只留下两条材料可供我们探索，一条是：“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一条是：“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根据这两条材料，可知王符为侧室所生，因为不得志于当世，乃隐居著书。从《潜夫论》引文中看，王符在青壮年时是广泛阅读了经书与诸子著作，后来又隐居专门从事著述，在古代家庭经济上没有相当的优越条件，要博览群书，隐居著述，是办不到的。因此，可知王符的家庭，不是个庶族地主之家，便是官位不显的士宦之家，他本人也应当是庶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一推断也可以从《潜夫论》的一些论述中得到证明：他一方面常常将自己置于与豪族地主对立的地位。如他表示，宁肯“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而不“圆囷曲躬”“毁颜谄谀”，并且立志要和那些出身豪族之家的权贵，势不两立。（见《潜叹》）；另一方面也一再表白自己是无门阀、无身份、而又贫贱的人，主张政府用人应当以贤能为主。他说：“苟得其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本政》）“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认为只有打破“门阀”、“世族”的框框，在下层中选贤与能，汉室才有“中兴”的可能。他的这种议论和前引本传中的两条材料结合来看，我们可以断定他是庶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二、王符的世界观

王符的《潜夫论》三十多篇中专门论述世界观的文章仅

有《本训》一篇，且极简略。因此，我们讨论这一问题，就不能局限于这一篇，而是要从全书着眼来探讨。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必然贯彻到他的认识论、历史观、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王符也不例外。这样从全书来研究能使我们对王符的世界观作全面深入的了解，不至于以偏概全。

王符对世界本源的论述是：

“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本训》）

这段文字说明了世界的本源及万物主要是天、地、人形成的过程。王符认为世界的太初是“元气”，是一团混沌，经过长久的运动，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二气。由此二气产生了天地。有了天地，出现一种“和气”，“和气生人”，这一过程全是“气”的运动。这种用物质的某种具体形态（如水、火、气等）解释世界的本源与统一性是古代唯物论者的普遍特征。“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東西，某种形成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页）这种对世界本源与统一性的解释，在人类哲学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证明是经不住唯心论的反驳的，因为，这种论证经不起追问，问下去就必然逻辑地陷入唯心论。尽管如此，在当时谶纬神学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中，王符是坚持了先秦唯物主义的传统，以物质本身的运动去解释世界及万物的形成的思想是有力的反对了当时统治人们思想的神学世界观。

王符阐释了世界本源与统一性以后，接着就论述世界中各种自然物，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变化。他说：

“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变化乃成。是故道之为物也，至神以妙，其为功也，至强以大。天之以动，地之以静，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时五行，鬼神人民，亿兆丑类，变异吉凶，何非气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气裂之，地之大也气动之，山之重也气徙之，水之流也气绝之，日月神也气蚀之，星辰虚也气陨之。旦有昼晦，宵有大风，飞车拔树，愤电为冰，温泉成汤，麟龙鸾凤，螽蟴蜉蝣，莫不气之所为也。以此观之，气运感动，亦诚大矣。……正气所加，非唯于人，百穀草木，禽兽鱼鳖，皆口养其气。”（《本训》）

王符这段论述可分两层说明：一为“道”是“气”的根并促使“气”的变化，“道”这种功用是十分神妙的，再是由“道”作为根的这种“气”的运动，形成了自然世界、社会中各种物质的变异。这里说的气无异是物质的，而“道”是什么呢？“道”怎么会成为“气”的根呢？十分明显，王符这里的“道”不同于有些古代哲学家著作中用“规律”“法则”可解释的“道”，而是同“元气”（或气）并列的一种有点神秘味的东西。如果说是“规律”“法则”的话，他只能从属于物质，它不能“为物”。可见王符把“道”是看作与气并列甚至高于气的另一种本体，很清楚的表明了王符世界观是二元论。

王符世界观为二元论，还表现在他对古代哲学中争论很长久的一个问题的认识上，这个问题即天是自然的，亦是意志的。王符一方面认为有意志的“天”，这种天主宰人类社

会的变化与斗争，另方面认为有自然的天。

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论述如：

“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遏利》）

“圣王之建官也，皆以承天治地收养万民者也。”

（《考绩》）

“夫圣人为天口，……圣人之言，天之心也”。

（《考绩》）

“世主欲无功之人而疆富之，则是与天斗也；使无德况之人，与皇天斗而欲久立，自古以来未之尝有也。”

（《思贤》）

“天之所甚爱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爱，焉可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忠贵》）

“书称：‘天功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忠贵》）（《忠贵》全篇提到的“天”为有意志的天，仅引此二例）

“天保佑王者，定其性命，甚坚固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尚者信也”。（《慎微》）

“太古之时，烝黎初载，未有上下而自序顺，天未事焉，君未设焉。后稍矫虔，或相陵虐，侵渔不止，为萌巨害。于是，天命圣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愈共奉戴，谓之天子”。（《班禄》）

夏殷二国之政不得，乃用奢夸靡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班禄》）（这里上帝也出现了。）

“天子在于奉天威命，共行赏罪。（《述赦》）

“王者之贵，与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虑，未发声色，天为变移。”“天道赏善而刑淫”。（《述赦》）

“乃诸神祇：太岁、丰隆、钩陈、太阴将军之属，此乃天吏，非细民所当事也。天之有此神者，皆所以奉成阴阳而利物也。”（《卜列》）

王符认为天既是自然的，也是有意志的，其论述如，“天地开辟有神民，民神异业精气通，行召有招，命有遭随，吉凶之期，天难谶思，圣贤虽察不自专，故立卜筮，以质神灵。”（《卜列》）此段天地并列的“天”为自然的“天”，借用《诗经》“天难谶思”这句表述自己意见的“天”是意志的“天”。

在《潜夫论》中阐述社会问题时意志的“天”占主要地位。他用这种意志的“天”不断警告统治者，“天之所助者顺也”，“与天斗”是不会长久的，因此，认为“恶政必亡”是因为不顺“天命天意”，不是象有的同志说的是“依据自然变化法则来看社会法则，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恶政必亡。”（《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426页）。

对神与迷信思想，王符也进行了批判，且有些批判还是尖锐的，但又不敢大胆否定神，常常承认神的存在与其作用也不敢彻底批判巫覡的迷信活动，还认为有存在的必要。这里他比王充大大地后退了一步。

上述的材料与分析充分说明王符在世界观方面是二元论者，且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倾向于唯心论。“最彻底的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远是倾向于一元论，即借助于某一个基本原则去解释现象（*Monos*按希腊文是统一的意思）。”（《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一卷，第570页，着重点为原有的）

王符思想的不彻底，不深刻的表现十分明显。这是受了他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反映了庶族地主的软弱性与妥协性；而且也受着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再加上他的隐居生活，更使他的思想上落后面大了一些。

西汉自武帝时“罢黜百家，定于一尊”以后，天人感应的神学的世界观一直占统治地位。东汉光武帝建立政权以后，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讖于天下”，作为统治思想，决定国家的大事都得在讖记里找“根据”，桓谭作光武帝的议郎官时，曾表示不信讖记，几乎被杀头，可见当时思想统治之严。到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召集一批儒生，讲议五经同异，最后由班固整理出来，称《白虎通义》，这是东汉时一部儒家经义与讖纬杂揉的神学经典，用来统治士人及广大人民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页）在这种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王符继先秦及两汉进步思想家的传统，坚持唯物主义的宇宙本源论，肯定了宇宙的“太初”是“元气”，并认为自然界与社会中许多事物与现象是“气”的运动，这肯定是有战斗作用的，是进步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他落后的一面，神秘的“道”、意志的“天”等的坏影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他的二元论的世界观的不彻底性（唯物论的不彻底）与妥协性。

王符的知识论

王符的知识论与他的世界观紧密的联系着，也同样具有二元性，一方面认为知识来自“先验的”经典，另一方面又

提出了相当于实践的观点，强调人在行动中获得知识。并提出：“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用“志行”“效验”检验知识真假的论点。

王符的认识论中首先承认人的自然智力是平等的，都是“学而知之”，没有“生而知之”，即使“是至圣者”也不能例外。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颡项师老彭，帝尝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赞学》）

王符对人通过“学”才能获得知识，比喻如象对原料的加工一样，经过锻铸或镂刻才能成为有用的器皿。他说：

“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虽有玉璞卞和之资，不琢不错，不离砾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茧之丝耳，使巧倕加绳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机杼，则皆成宗庙之器以之章，可羞于鬼神，可御于王公。而况君子敦贞之质，察敏之才，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黜黜《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济乎！”（《赞学》）

这里不仅说明了学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学的内容，既要有朋友的帮助，又要有老师的教诲，既读诗书，又学礼。可见王符说的“学”是多方面的，包括读书与实行在内，这都是知识的来源。

王符认为学是为“明道”。“道之于心也，犹火之于人目也。中阱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已知矣。天地之道，神明之为，不可见也，学问圣典，心思道术，则皆来睹矣，此则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则为已知矣。”（《潜夫论·赞学》）这里说的“道”包涵有客观规律或事物的道理的意义，明“道”即认识客观规律事或物的道理，但也未脱去神秘气味，他说“天地之道”是“神明之为”可证。

获得“道”的主要途径是“经典”。王符说：“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这种典是怎么来的呢？“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其行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先圣之智，心达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经典，以遗后人。……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人心也。”（《潜夫论·赞学》）王符所说的经典，是圣人以其“心”来造的，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前人从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间接“知识”的意思，而是“先验”的知识，后人学这种“先验”的知识往合“圣心”，就可“明道”。

王符在知识的来源中强调学习“经典”，是针对当时的编造讖纬的鄙儒而发的，因为这些人早已把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丢的一干二净。王符想借古人的亡灵唤起当代人们的革新精神，摒弃东汉统治阶级的庸俗不堪的宗教神学思想。这是王符的伟人之处，也是王符知识论中局限性所在。

王符在强调学习“经典”，获得知识的同时，也注意了人在日常生活中与斗争中“人为”获得的知识。

“有布积善不怠，必致颜，闵之贤，积恶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独布衣也，人臣亦然，积正不倦，必生节义之志，

积邪不止，必生暴戾之心，非独人臣也，国君亦然，正教积德，必致安泰之福，举措数失，必致危亡之祸。故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废兴也，在其所积。”（《慎微》）

这段所讲的中心是“人为”的作用，可分以下几点说明（一）“人皆可为尧舜”，皆可以有颜渊、闵子骞的品德。颜、闵这些人不是天生的明王圣哲；相反的桀、跖之类也不是天生的恶棍坏蛋。那么，一个人品行善恶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即是（二）“在其所积”。“积”是日常行动，在日常行动中干什么？经常做正义的事情，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会获得高深的知识，养成优良的品德；相反的，经常做非正义的事情，必然得出相反的结果。从这里我们看出王符相当重视实践对人获得知识、进行修养的作用。（三）可以看出，这里已经超出他的知识来自“经典”的论点了，而承认“经典”以外的知识来源了，这个来源即是实践。当然，我们不能把王符所了解的实践，与我们今天了解的实践的涵义等同起来，他那时了解的实践是封建道德的修养、封建礼仪的力行等。

王符对“人为”，即人的主观能动强调的十分突出。他虽在认识中一方面承认有意志的“天”、“命”等对人的支配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甚至有些方面认为只要积极努力，“天”与“命”可以不会有多大影响。

《巫列》篇曰：“夫妖不胜德，邪不伐正。……人君身修正，赏罚明者，国治而民安。民安乐者，天悦喜而增历数。故《书》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最却灾致福善之本也。”

这里承认“天助”的前提下，强调“人为”。

《相列》篇曰：“智者见祥、修善迎之，其有忧色，〔修〕〔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虽休徵见相，福转为灾。于戏君子，可不敬哉。”这里承人骨相对人的事业、生活有关系，但智者与愚者主观努力不同，而结果大不一样：智者“修行改尤”，愚者“福转为灾”，实际上几乎否定了“骨相迷信”。

“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之行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摆舟船矣。虽为所复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天呈其兆人序其助，《书》故曰：天功人其代之。”（《本训》）这是王符对人的主观能动的总论。

由于王符在认识中强调“人为”，所以，他进一步提出观察、证明一种知识的真假，“必效于实”的观点。他说：

“有号者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考绩》）

这种观点用来观察国家政治：

“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故君臣法令善则民安乐”……（《本政》）

这种观点用来观察人的贤愚应当：

“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于效验，不随俗而雷同，不逐声而寄论。”不能象“凡品”那样“平议无埶的，讥誉无效验，苟阿贵以比党，苟刺声以群吠”。（《交际》）

从这种“效于实”的观点出发，王符反对那种用表面现象观察人或事的认识方法。他说：

“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刻君子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困〕辱阨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

以为小人者也。……故论士苟定于志行。”（《论荣》）

王符从这种效于实的观点出发，并揭露了当时社会名实相悖的邪恶现状。他说：“有号者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今则不然，……群僚举士者，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号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器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称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官听所以数乱荒也。”（《考绩》）王符以他这种“效于实”的检验知识的观点为指导，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的批评是大胆的有力量。王符在认识中强调从实际中获得知识，强调人的主观在认识中的作用，并认为知识的真假“必效于实”。在谶纬神学统治的时代，一切都听信图谶的黑暗年月里，这一思想是十分犀利的武器，是刺破黑夜的一线火光。

四、王符的历史观

王符的历史观是继承了先秦进步思想家的观点，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更新，在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政治法律等也在变革，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这是同他对整个自然界与社会的看法相联系着的。

他认为客观的物质是在不断运动着：“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有变化。”（《边议》）

运动着的物质的变化是按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前进着，王符说：“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断而颓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积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积下不已，必极黄泉之深。”（《慎微》）“夫贫生于富，

于强，乱出于治，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也，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浮侈》）这里可以看出王符认为质变（如山高等）是量变（如步增等）而来的，量变可以转化为质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与原来的质变完全相反，如不“慎微防萌，以断其邪”富而以变贫，强可以变弱，治可以变乱，安可以变危。可见，王符在某些方面是意识到质量互变的关系。

王符将这种变动不居的观点用来观察社会历史。他认为：

“太古之时，蒸黎初载，未有上下而自顺序，天未事，焉君未设焉。后稍矫虔，或相陵虐，侵渔不止，为萌巨害。于是，天命圣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金共奉戴，谓之天子。”（《班禄》）

这里，王符所叙述的是大体符合历史实际，认为人类社会开始是无阶级、无压迫的；阶级的出现是以后的事，国家、天子等是随阶级产生而产生的。因为“或相陵虐，侵渔不止”，为了统治，所以就出现了“圣人”、“天子”。当然，王符这是说“天子”是受天命而立的，无疑是自己受了骗又骗别人的说法。

王符并认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政治法律也随着变革。他说：

“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盖世推移而俗化异也。俗化则乱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断讼》）

这里显然是受了先秦法家思想中变法的思想影响。

王符的历史观中值得提出的还有他继先秦“民本思想”优良传统提出“民为国基”的思想，这是贯穿在他的整个著作中的一个思想。他认为民是“天心”，社会混乱，私稷安

危，国家兴亡，与民关系极大。他说：

“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逆心。……民安乐则天心慰，天心慰则阴阳和，阴阳和则五谷丰，五谷丰而民眉寿，民眉寿则兴于义，兴于义而无奸行，无奸行则世平而国家宁，社稷安而君尊荣矣！”（《本政》）

“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愿察开辟以来，民危而国安谁也？下贫上富者谁也？”（《边议》）

王符对“民”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是重视的，这是对把“民”视为“螟”（董仲舒语）的思想的反动。王符在对社会政治批判中始终贯彻他这一思想，因此，许多方面十分大胆地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面目，也替农民倾诉了一些苦难。但是，对王符这一思想也不能评估过实，他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从前朝（秦、西汉）及当朝的农民反抗中得到教训，看到如果对广大农民的剥剥是竭泽而渔，农民无法生存时，就会斩木揭竿而起。这时，地主阶级不仅进行剥剥成问题，而且会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平时，他也看到地主阶级离不了农民，离了农民剥剥无对象了，这是从当时农民流亡的事实中吸取的教训。尽管王符这种观点，并未超出地主阶级狭隘的视野，不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理论等量齐观。但却必须肯定他这种“民为国基”的思想的历史作用。

王符历史观中的局限性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憧憬太古，美化先王。王符虽然认为历史在前进，但是，他不完全满怀信心对待未来，改造当世，而是认为古

代一切都好，向后是每下愈况，他称当时“末世”、“衰世”，“季世”。而是认为上古一切都好，例如说：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圣抚之，恬澹无为，体道履德，简刑薄威，不杀不诛，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劝将》）

“无宪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画则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德禁而和海内者三王也。……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蹶其卑者，然后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国，然后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齐三王，然后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齐五帝，然后三皇之道，乃可从也。”（《衰制》）认为一代一代，每下愈况，例如说：

“上圣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尧舜是也。其次躬道德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故能使民无争心而致刑错，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恶而显法禁，平赏罚而无阿私，故能使民辟奸邪而趋公正，理弱乱以致治强，中兴是也。治天下身处汙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乐，近顽童而远贤才，亲谄谀而疏正直，重赋税以赏无功，妄加喜怒以伤无事者，幽厉是也。”（《德化》）

王符这里虽然是说明：“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的论题，但也排了个历史次序，表明一代不如一代，周文武二王不如尧舜，周宣王不如文武，周幽王厉王更不如宣王（厉王虽在宣王前，但不影响王符对历史的这一看法）。到了春秋战国以至秦汉，在王符的眼中是“季世”、“末世”、“衰世”，这不能说不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悲观论调。

王符美化先王是为了批判当时社会，他的公式是：“先王……，今则……。”这在许多篇章可见。王符赞美先王的

圣德丰功，批判当时社会的弊病，期望古代的三皇五帝的亡灵能唤起当时执政者中的明君贤臣起来革新。王符的批判是尖锐的，而这种企求则是杳茫的。

其次明君贤臣决定历史。王符认为“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德化》）“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明暗》）“近古以来，亡代有三，灭国不数，夫何故哉？察其败，皆由君常好其乱而恶其治，憎其所以存而爱其所以亡。”（《思贤》）

君明还得有贤臣扶佐。他有《贤难》、《明暗》、《考绩》、《思贤》、《本政》、《潜叹》、《实贡》等很大一部分篇章谈论选用贤臣的问题。王符的思想中认为治理国家有了明君加贤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反之社会就会大乱。历史似乎是由这几个人决定的，“民为国基”即是在这个前提下提出的。

最后王符摆脱五德说之影响，相信迷信传说。这里先对五德说作个简单介绍：五德说认为阴阳五行统摄自然界、社会的一切事物与现象，用阴阳统摄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用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摄时令、方向、道德、色味、人身，等等，以至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这一学说根据《史记》记载是“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秦始皇时认为黄帝是土德，夏是木德，殷是金德，周是火德，秦为水德。这种虚构的历史系统的思想到了汉代更加盛行，汉高祖刘邦打入关后，自认是水德，乃立黑帝祠。到了文帝时，公孙臣提出汉推翻了秦，应为土德，当时丞相

张苍不同意，“以为汉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史记封禅书》）到王莽时，为给他篡夺汉王朝立论，在当时御用文人的协助下，又对五德说的历史系统进行了一次整理，确定了他是舜后，是土德，把汉改成火德。东汉光武帝刘秀利用这种说法，就自认继汉统是火德。过去历史学家称东汉为“炎刘”即由此而得。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五德是统治阶级为欺骗愚弄人民，纯系编造虚构的东西。王符在他的《五德志》中说：神农是火德，黄帝为土德，少昊为金德，颧顼为水德等，并相信古代的迷信传说，认为古代帝王的出生是其母“履大迹”、“梦长人”等等。这些说法王符认为“虽未必正，可依传闻。”（《叙禄》）是有怀疑的，但我们说他未摆脱这种谬说的影响是恰当的。

王符的历史观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但有很多糟粕，而且占主要方面。因此，应当说，他的历史观的基调是唯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都摆不脱的悲剧。这是因为，他们个人的阶级地位限制了他们，当时狭小的生产关系限制了他们。王符是个庶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处在偏僻而闭塞的农村封建经济生活中，他的视野所受的限制就更大一些，更显著一些。

五、简短结论

关于王符思想的几个主要问题，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

一、王符的世界观是“气”“道”二元论者，而主要倾向是唯心主义，不是象有些人认为的基本是唯物主义。

二、王符把二元论也贯彻到他的知识论中，认为人的自然智力是不差上下的，人皆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知